

京师人文宗教讲堂

2012年卷（总第二卷）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师人文宗教讲堂

2012年卷（总第二卷）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师人文宗教讲堂. 2012 年卷: 总第 2 卷 /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
宗教高等研究院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161-6470-9

I. ①京… II. ①北… III. ①儒家-文集②道家-文集
③佛教-文集④中医学-文集 IV. ①B-53②R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378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5.25
插 页 2
字 数 418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京师人文宗教讲堂”系列讲座是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举办的纯公益性学术讲座，面向广大师生，面向全社会，邀请海内外人文宗教领域著名专家学者主讲。讲堂开设儒学、道学、佛学、中医四个系列讲座，每月两次，于当月双周周六上午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内举行。自2011年起，已历四年。

讲座视角多元，内容广泛，兼顾学术与普及，不仅受到在京高校师生的欢迎，也得到社会各行各业众多人士的肯定。不少听众、包括一些未能到场聆听的人士希望得到讲座的相关资料，而将研究院主办的论坛、研讨会、讲座中专家学者精彩演讲结集出版，以饗读者，本在研究院规划之中。

2011年，研究院出版了《固本强身 走向世界——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揭牌典礼暨首届高端论坛文集》，其他如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医养生论坛、北京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儒释道融合之因缘研讨会、两岸四地茶文化高峰论坛、方东美哲学思想研讨会等会议论坛文集亦已结集，不日即将出版。

“京师人文宗教讲堂”系列讲座2011年所讲内容，已收录于2012年出版的《相克相生 共进共荣——“京师人文宗教讲堂”讲演集（2011）》。现在奉呈给读者的，是2012年所讲内容的文集。之后“京师人文宗教讲堂”系列讲座内容，亦将按年结集出版。此系列文集，将均以《京师人文宗教讲堂》为名，分年计卷。因以《相克相生 共进共荣——“京师人文宗教讲堂”讲演集（2011）》为第1卷之故，本书标以“2012年卷（总第2卷）”。

相信文集的出版会让更多的朋友了解京师人文宗教讲堂，期待更多的朋友与我们共同推进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目 录

儒学系列

- 汉魏石经与儒学传承 上海社会科学院 虞万里 (3)
- 春秋学与传统政治 南开大学 赵伯雄 (31)
- 《清儒学案》与治学之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 陈祖武 (55)
- 清代汉学的学术成就与思想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 黄爱平 (71)

道学系列

-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教 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卡 (93)
- 《道德经》的精神——节制与宽容 北京大学 王博 (119)
- 大道清虚 北京大学 王宗昱 (141)
- 道教养生 中国道教学院 孟至岭 (164)

佛学系列

- 佛教对生活的看法 黑龙江省佛教协会 静波 (197)
- 祖师西来意：对禅宗中国化和中国化禅宗的考察
——以《祖堂集》《五灯会元》相关公案为例
..... 江西省佛教协会 纯一 (227)
- 佛教在欧美的形象变化
——兼谈全球化时代的佛教理念 北京大学 李四龙 (270)

禅者的生活 金山江天禅寺 心澄 (289)

中医学系列

中医学理论的特质与中华传统文化

..... 中国中医科学院 孟庆云 (309)

中华医道与中华文化 中国中医科学院 傅景华 (332)

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与公众健康

..... 中国中医科学院 柳长华 (362)

儒释道文化与中医文化的精神 北京中医药大学 张其成 (378)

儒学系列

汉魏石经与儒学传承

主讲：上海社会科学院 虞万里教授

时间：2012 年 3 月 24 日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

主持人：各位朋友，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们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的京师人文宗教讲堂儒学系列讲座，今天专门请来了从上海专程来给我们作报告的虞万里教授。

虞万里教授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同时也是华东师大双聘的教授。虞万里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非常宽广，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块就有着非常多的研究成果和建树。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儒学领域里，他有非常多的重要研究成果，不仅在传世文献，也包括从 20 世纪末以来直到现在清华简在内的一些竹简的研究，虞先生都有非常多的成就，在海内外的影响也非常大。他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国外很多地方做过讲学、交流、讲座。

虞先生非常忙，但是他愿意和我们人文宗教讲堂一起做发扬光大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工作，来尽他的力。虞先生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他是我们学界非常著名的一位孝子。另外，他很早就得过国内“王力语言学奖”，当时很少有青年人获得这个奖项，获奖的时候他是最年轻的学者。刚才说的是他学术造诣的方面。

另一方面是他在传统文化上的修养，他在诗书辞赋创作方面也都是很有建树的。所以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虞先生给大家作题为“汉魏石经与儒学传承”的讲座。今天还有这么多的听众来听，其实这讲也是我们的一个尝试，我们会把高端研究和普及宣讲相结合，让听众和我们互动，希望听众多给我们反馈。我们会有很多新的尝试，今年是其中之一。下面有请虞老师给我们作报告，谢谢！

虞万里：主持人的介绍使我很惭愧。因为孔子传下来的儒家经典是一门浩瀚无际的学问，我在几十年中间所学到的仅仅是沧海一粟。本着这样的理念或精神，我觉得在有生之年，能够多学就多学。今天很荣幸被邀请来这儿跟大家作交流。

我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因为前两讲有的老师讲了儒家的精神或者回归孔子这样的题目。我想理性层面的认识当然很需要，但我们今天得以领略或理解的儒家经典是否与孔子和两汉经学时代流传下来的经典完全一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层出不穷的竹简出来以后，有人说可以改写学术史，我认为这个命题确实让很多人翘望，但很难回答，到底能否改写？改写多少？这要依据我们的立足点和今后的研究来作最后的结论。当然，这是先秦和两汉之前的东西，今天我要讲的是汉魏以后的石经与儒家文本的关系。

我们今天得以理解、领略的儒家经典，从大致的形式来看，源于六朝的抄本，六朝时还没有刻本和印刷。六朝抄本之后，经历了从唐朝初年的《五经正义》到中唐张参的《五经壁本》，然后到开成石经——开成石经现在还陈列在西安碑林。然后是北宋初年的校勘本——先是单疏本，后是南宋注疏的合



图1 熹平石经

刻本，再下来就有明代李元阳的《十三经注疏》的合刻本，就是版本学上所称的九行本。现在我们所阅读的，包括点校本哪怕是简体字本，一般都是从嘉庆年间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本翻刻或排版、影印过来的。现在我们对各种经典的理解和解说都是在这样一个系统下建立起来的。如果推向六朝之前，当时的文本是否和现在的一样，如果有差异，这种差异有多大。我认为这是理解汉魏石经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先秦的文本一般情况下都是用竹简写的，尽管还有其他质料的文本，但不管怎么样，到东汉末年郑玄在注《三礼》的时候，他所凭借的仍是竹简，所以他在注文里都会谈到哪些地方简残看不清楚，哪些地方应该移位到哪里。公元200年郑玄死的时候，阅读记录的还是竹简。在此之前不久，也就是公元175年灵帝熹平四年的时候，刻立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熹平石经。

刻立熹平石经有一个过程，也有一个前提。《蔡邕传》中说到蔡邕在东观校书的时候发现经籍中有很多差异，即文字多谬、俗儒穿凿，我认为这是文字发生讹谬以后，经典需要统一的一个重要内因。外因上来讲，源于这样一件事情，公元167年党锢之祸，当时很多学者被流放到外地，党锢之祸平息后，三科考试才得以重新恢复。当时博士选三科的考试，最高可以做到尚书，其次是刺史，再下面是到各个地方做太傅，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职位。因此为了争夺考试名额，许多人就互相告发，甚至私行贿赂兰台的官吏，甚至还把当时竹简上的字改从自家的文字，这样在考试的时候他就可以高第。《宦官传》里记载，李巡因为这件事情向皇帝进言，要求把经文统一刻在石碑上，昭示天下，这样就可以避免贿赂、篡改文字的情况。这是触发刊刻熹平石经的外因。

内外因之外还有契机，当时为什么不用其他形式校正经文呢？因为东汉是碑刻盛行的年代。经统计，今存东汉碑刻，桓帝时有59块，灵帝时有76块，桓灵之间，也即熹平前后是石刻最盛行的年代。用当时最通行的方式，是时人最能接受的。将经典镌之于石，立之于太学，自然可以“定于一尊”。东汉立五经十四博士，每经都有几个师法家派，石经以一家为定本，其他家法异文作为校记置于各经之后，这样，任何一家师传都可从中得到自己的标准文本。东汉时蔡邕的经学、书法均有极高造诣，所以由他领衔，杨赐、马日碑、张驯、韩说、单飏等二十余人参与工作。图1为熹平石经的周易残石。

熹平石经从熹平四年开始刊刻，到光和六年（183年）刊成。不到十年，董卓迁都邺城，焚烧洛阳，石经崩裂，遭受损毁。曹丕继位（220年），曾下诏进行校补。《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说：“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学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虽然太学开始招生，并依照桓灵考课的甲乙形式考试，但曹魏之际的经学却在悄悄地变化。

熹平石经刊立后不到70年，即魏废帝正始二年（241年），在洛阳刊刻了三体石经。熹平石经还没有毁坏，为什么要刻三体石经呢？这与汉魏今古文经学问题有关。熹平石经所镌刻的都是今文经，即今文十四博士文本。正始二年所刊刻的则是古文经。为什么要刊刻古文经呢？从历史上看，在熹平石经刊立后的数十年间，《易》、《书》、《诗》、《礼》或其他

的经典，大多都已传习古文经，与东汉中期相比已大有改观，故王国维总结出两个原因：

第一，曹魏年间，诸经多已立古文博士，古文家觉得今文经有自己的石碑，自然也希望有自己的石经古文本。

第二，东汉古文经学家多是小学家，所谓小学就是文字、音韵、训诂，说明当时他们都能够读写古文字，甚或在文字形体上有造诣。

有鉴于此，加上政治需要，所以在70年之后刊刻三体石经。三体石经上面是一行古文，中间是篆体，再下面是汉代的隶书，故称。因在曹魏正始年间刊刻，故也叫正始石经。

三体石经出土的相对要少，只有《尚书》和《春秋经》二经，《左传》也有一小部分，但现在看到的只是宋代留下来的。这是可能1957年发现的石经，孙海波后来把石碑下面的顺序做了研究，他进行了排定，认为是正反面28块，才有这样的数据。

三体石经第一行都是古文，这和当时的学术倾向有关，它的来源主要是孔壁的古文。汉武帝末年，鲁共王将孔子老宅毁掉准备重建，拆建过程中发现很多古文经，有《书》、《礼》等，文字都是古文，与现在出土的竹简相似，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六国古文，和西土秦文字体有差别。在熹平石经刻成几年之后，汉灵帝因个人的喜好，建立了鸿都门学。鸿都门学是很多工鸟篆书的人聚集在一起研讨文字的机构，可见那时文字形体学非常发达，给几十年后用古文来书写经典打下了基础。

图2文字是由上向下竖排，最上面的就是古文，依次为篆书和隶书。图3是古文在上，下面是左隶右篆，称为品字形，非常精美。



图2



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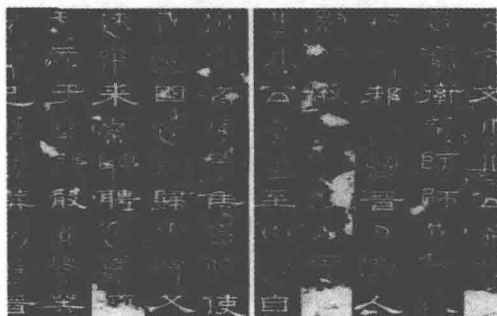


图4 张钊藏的拓本



图5 孙海波的《集录》本

汉魏石经刊立后遭到多次迁徙和损毁。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即永嘉之乱，王弥、刘曜到洛阳后焚毁太学，这是石经第一次遭受巨损，据说三十几块石碑只剩下十八块。北魏孝文帝延兴年间（471—47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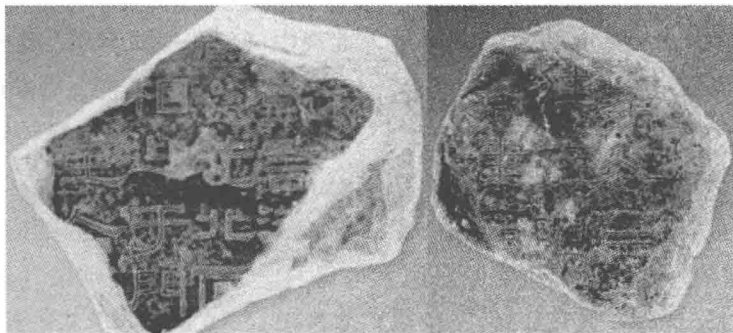


图6

佛教徒冯熙出任洛州刺史，废毁石碑用作佛塔，致使石经毁坏，委弃榛莽，让人随意拾取。图6是1980年前后在洛阳太学发现的残石，这些残石周围已经磨损，或许就是损毁后挪作他用的标识。虽然后来大学者崔光曾建议修补，但最终因事未果。东魏武定四年（546年），孝静帝将洛阳汉魏石经迁往邺都，不意运输到河阳，遭值岸崩，很多经碑沉到河底，迁到邺都只剩一半。北周大象元年（579年），宣帝又把这些石碑从邺都迁到了洛阳。到了隋朝开皇六年（586年），隋炀帝又把这些石碑迁到长安，置于秘书省内，因几经迁徙、搬运，已所存无几。当时省议欲补辑，立于国学，适逢兵乱，不但没有修补，仅存的残碑亦为营造司用为柱础。战乱结束，魏征接手皇家图书馆，征收经碑，想把它们聚集在一起，竟已十不

存一。殘石虽所存不多，但当时的拓本犹在祕府——说到拓本，得需补述一句。有人说传拓技术在石碑建立之后就有了，其实这种说法至今还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至少蔡邕刊刻石经前后没有拓本。假如当时有传拓技术，就不可能有《后汉书》所记，很多太学生乘车从各地赶来，争先去临摹自己一家师法的文字。我觉得这种传拓技术应该是两晋以后才有的，至少是左思写《三都赋》“洛阳纸贵”之后，才有可能用纸在石碑上施行椎拓——《隋书·经籍志》有“一字石经《周易》一卷，梁有三卷”、“一字石经《尚书》六卷，梁有今字石经郑氏《尚书》八卷，亡”、“一字石经《鲁诗》六卷”等，这种记载，说明唐代皇家图书馆里确实藏有拓本，而且应该是剪贴可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熹平石经《尚书》用欧阳本，三体石经《尚书》用马郑本。今秘府有郑玄隶书石经《尚书》，必是从三体石经《尚书》中截取隶体拼接而成。《隋书·经籍志》所谓“梁有”，是阮孝绪《七录》所载，据此推测梁代已有剪贴的石经拓本。

根据唐代韦述《西京新记》载，贞观中（627—653年），秘书监魏征参详考验蔡邕的三体石经，只有数十段，就放在九成宫内，后来移到了著作院，到开元间只剩下“十三纸”。这拓本上钤有大书法家钟绍京的印，说明朝廷也开始重视。

到了宋朝，有人开始搜集。因为宋朝的古玩收集已经成风。邵博《闻见后录》说：“近年洛阳张氏发地得石十数，汉蔡伯喈隶《尚书》、《礼记》、《论语》各已坏缺。《论语》多可辨。”姚宽《西溪丛语》也说：“往年洛阳守因阅营造司所弃碎石，识而取之，凡得《尚书》、《论语》、《仪礼》，合数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长安，其上马日碑等所正定之本。”他们所记之残石有的是重合的，有的则并不重合。

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在《金石录》一书中专立《汉石经遗字》一节，不仅著录逸文，而且还与传世文本校核，说“以世所传经书本校此遗字，其不同者已数百言，又篇第亦时有小异”。所谓篇第小异，指《诗经》、《尚书》或《仪礼》，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次序不同。可惜他没有把这些异同记录下来，以致此后800年中没有人知道石经篇第与传世本有什么不同。宋代印刷技术普及，宋人重视搜集石经，虽然对保存石经有利，但从另一个层面上讲，这种搜集保存在存古意识驱使下，更侧重于残石古文、隶书的书法价值。因此他们不仅摹录唐代拓本，还依仿翻刻。就开元“十三纸”而言，先是由郭忠恕截取其文字，编入其所著之《汗简》中；

云是王魏公家故物”，但“石文剥落者太半，纸尾犹存蔡邕、马日碑字”，陈以汉石经遗吴，复寄诗索石鼓文，吴答诗有云：“横山先生多古玩，太学石经分我半。魏公世藏资州本，金石录中还散乱。”清代学术在各个方面都有长足进步和发展，收藏、考释不乏其人。从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到朱彝尊《经义考》，都详细地记载了汉魏石经的流传轨迹。金石收藏家黄易曾藏有汉石经《盘庚》五行、《为政》八行、《尧曰》四行。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记载，乾隆五十年，他在书肆中购得《管子》一部，里面夹有双钩本石经文字。经他细心寻绎，区别恢复，才知是《尚书·洪范》篇78字，《君奭》篇13字，《鲁诗·魏风》73字，《唐风》31字，《仪礼·大射仪》37字，《聘礼》28字，《公羊·隐公四年传》18字，《论语·微子》篇170字，《尧曰》篇39字，又盍毛、包、周有无不同之说及博士姓名18字，合500余字。虽不详何人所摹，但《管子》第一册上有清初徐树丕印记，则推知为徐氏所勾摹。于是钱氏课徒之暇，亲自刻石，刻成后椎拓三百多本分赠同好，一时轰动学界。翁方纲先购得黄氏拓本，后又得钱氏摹本，遂在江西南昌学宫将残字重新摹录，分为十二段，刻在石板上。他认为这是儒家的经典，刻立在学宫里有象征意义。于是各地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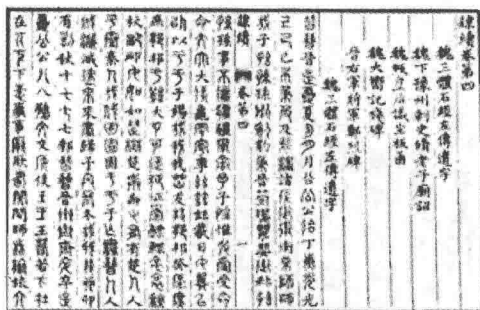


图9



图10

争，区别恢复，才知是《尚书·洪范》篇78字，《君奭》篇13字，《鲁诗·魏风》73字，《唐风》31字，《仪礼·大射仪》37字，《聘礼》28字，《公羊·隐公四年传》18字，《论语·微子》篇170字，《尧曰》篇39字，又盍毛、包、周有无不同之说及博士姓名18字，合500余字。虽不详何人所摹，但《管子》第一册上有清初徐树丕印记，则推知为徐氏所勾摹。于是钱氏课徒之暇，亲自刻石，刻成后椎拓三百多本分赠同好，一时轰动学界。翁方纲先购得黄氏拓本，后又得钱氏摹本，遂在江西南昌学宫将残字重新摹录，分为十二段，刻在石板上。他认为这是儒家的经典，刻立在学宫里有象征意义。于是各地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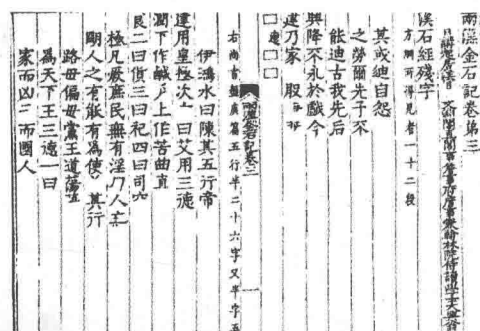


图11

相仿效，如绍兴知府李亨特及如皋姜氏、吴门刘氏都有重模本。王昶则在《金石萃编》中收录了当时学者的一些题跋文字。唯当时段玉裁对钱泳的拓本有所怀疑，后经王国维以行款推排，证明钱泳的拓本确实有非汉石经的文字。



图 12

可以说清代光绪以前一直上至蒙元，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真实的石经，



图 13

所见都是流传的拓本。图 12 是清代雍乾间旗人董元镜所藏比较早的拓本，很可能是从宋代流传下来的。直到晚清光绪十八年（1892 年），人们才目睹真正的石经残石。据罗振玉记载，山东古董商范维卿在洛阳看到卖茶的小商贩坐着一块石碑，面上虽遭扑击，依稀字迹，再反过来看，也有文字，乃确定为石经，用两千钱把它买下来。这个传说有不同的细节，买价也记载各异，甚至说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发现的。但若看其（图 14）“光绪壬辰光县丁干圃购得曹魏三体石

经”印章，知道应该是 1892 年。范贾得石，售给黄县丁树桢。丁氏购得后请人鉴定，竟有人说是假的，丁氏一怒之下，不肯拓模，导致已拓拓本一张价值十金，非常昂贵。直至罗振玉记录并刊印在《吉石斋丛书》后，才广为人知。残石是《尚书·君奭》，有 120 多个字，全字有 110，半字有 12 个，这是清末民初最早出现的石经。很巧的是，在 30 年之后（1922 年），另一块可以和它相拼接的《尚书》残石也在洛阳城东三十里之大郊东朱家古墩出土。（图 15 上半段）

这块硕大残石宽约建初尺四尺一寸，高不及五尺。其出土状况也众说